

“后申遗时代”的花山文化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

唐华清¹, 黄红涛² (1.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崇左 532200; 2.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图书馆, 广西崇左 532200)

摘要 花山申遗的成功, 为广西左江流域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带来新的机遇, 把花山文化的传承、开发、保护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结合起来, 对边境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促进民族团结和谐, 巩固边疆安宁, 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以纵向历史分析法作对比分析, 探讨“后申遗时代”的花山文化在传承、保护与开发中怎样促进边境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阐明继承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与实现乡村振兴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 花山文化; 传承保护;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F 590.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3)07-0251-05

doi: 10.3969/j.issn.0517-6611.2023.07.058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The Huashan Culture of “Post-intangible-culture Era” an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the Southwest Border Ethnic Areas

TANG Hua-qing¹, HUANG Hong-tao² (1. College of Marxism, Guangxi Minzu Normal University, Chongzuo, Guangxi 532200; 2. Library of Guangxi Minzu Normal University, Chongzuo, Guangxi 532200)

Abstract The success of Huashan’s legacy brings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the Zuojiang River basin of Guangxi, and closely combining the strategy of the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prote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Huashan culture, which is of great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border ethnic areas, 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 unity and harmony,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peace of the frontier. Based on the vertical historical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he Huashan culture of the “post-relic age” can promot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border ethnic areas in the inheritanc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expound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heriting the excellent nat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realiz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Key words Huashan culture; Heritage protec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战略、新举措, 其中实施乡村振兴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战略目标。报告中明确其内涵和要求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其中以产业兴旺为重点、生态宜居为关键、乡风文明为保障、治理有效为基础、生活富裕为根本。在此背景下, 成功申请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的花山文化, 为我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带来新的历史性机遇, 紧密结合花山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开发,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彰显边疆文化、民族文化、红色文化特色, 打造富有西南边疆国门特色的文化产业品牌, 形成左江流域乡村振兴新范式, 对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和谐, 巩固边疆安宁, 夯实稳固边疆之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从兴产业、保生态、育乡风三方面出发, 旨在研究花山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开发对边境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探讨在申遗成功后如何借助花山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开发来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促进边境民族地区的繁荣、稳定, 促进民族团结和谐和边疆稳固安宁, 从中总结出边境民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可供借鉴的共通之处及普遍意义。

1 文化与乡村振兴

1.1 文献述评 “郡县治, 则天下安”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历史总结, 反映着特殊国情条件下我国国家治理的必然逻辑, 也是一个历史性课题。怎么治才能做到长

治久安, 十九大报告在系统总结历史发展规律和经验的基础上, 进行辩证分析, 明确指出: “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指出乡村振兴必须抓好产业, 保障生态, 建设文明乡风, 进而达到有效治理和生活富裕的宏伟目标。乡村振兴是个系统工程, 需要整体规划, 文化建设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关于文化与乡村振兴的研究, 学界探讨也很积极热烈, 取得颇多研究成果, 归纳起来,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观点。

1.1.1 系统论。认为乡村振兴是个系统工程, 文化发展繁荣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新型城镇化不是目的, 把广袤农村同步带入现代化并对其进行有效治理和改造, 乡村振兴才算完成了其阶段性历史使命。在城镇化加速的历史进程中, 物质家园的冲击也在加速度进行, 因而, 精神家园的呼唤是这一历史进行的必然要求, 认为记得住乡愁, 就是要保护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延续历史文脉^[1]。

1.1.2 本根论。有的学者认为没有了乡村文化, 乡村就如同失去灵魂一般, 实际上就没有了真正的乡村; 因此,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精神支柱, 文化是乡村振兴的动力和智慧之源, 实现乡村全面振兴需要把握好乡村文化的科学内涵, 只有实现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 才能持久地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2]。

1.1.3 目标论。有的学者认为, 乡村振兴的持续久远最终还是落在文化的繁荣发展上, 只有文化在村落中能够生根、成长和延续, 这个乡村过去才有记忆, 现在才有活力, 未来才有期待^[3]。

基金项目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中青年骨干教师科研启动项目(2017ZQ-GG003)。

作者简介 唐华清(1970—), 男, 广西天等人, 教授, 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收稿日期 2022-03-23

1.1.4 功能论。有的学者认为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具有功能属性和资源属性,应该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在反贫困治理中的作用,探索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脱贫致富的文化发展之路^[4]。

1.1.5 总体要求。有的学者以历史发展的逻辑和规律,对乡村振兴的二十字方针进行较为详实的解读,分析指出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振兴之路,把我国优秀农耕文化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生生不息、魅力无穷。并在深刻阐明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民族的精神记忆和民族的精神家园,文化也是乡村根脉的基础上,辩证地指出文化兴则乡村兴,文化强则乡村强,乡村文化兴盛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标志,明确推动乡村文化兴盛必须坚持先进思想引领,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5]。

1.1.6 方法论。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应以文化的发展为抓手,激活乡村振兴。有的学者认为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要根据不同的区域差异、区位差异和不同的资源禀赋及不同的发展阶段实施相应的振兴策略。民族地区应该抓住特色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优势,挖掘和利用民族地区丰厚的民族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文旅产业,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取得实效^[6]。

1.2 花山文化与广西左江流域乡村振兴 广西左江花山崖壁画是古壮族先民骆越民族在临江悬崖峭壁上陆续绘制而成,形成于战国到东汉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是用一种庄严神秘而肃穆的原始宗教仪式场景来表达古骆越民族同大自然的斗争,反映出古骆越民族生生不息的、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浸透着祈求本族群自身繁衍生息、风调雨顺、祛厄禳灾的强烈愿望和心声。花山文化属于丘陵稻作农耕经济文化类型,与大石铲文化、铜鼓文化一起,都与稻作农业有密切的关系,它们源于“那”文化(“那”在壮语中是水田的意思),即稻作文化^[7]。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政府多次组织调查,目前已发现崖壁画 81 个地点,共 180 处,延绵 200 多 km。其中龙州县 21 个地点 39 处,宁明县 8 个地点 29 处,崇左市 28 个地点 67 处,扶绥县 23 个地点 44 处,大新县 1 个地点 1 处。而著名的宁明花山崖壁画画面宽达 221.05 m,高约 40 m,尚可辨认的画像有 1 800 多个……堪称左江流域崖壁画的代表作。

2016年7月15日上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35项世界文化遗产、第49项世界遗产,也实现了我国岩画类世界遗产零的突破^[8]。申遗的成功,让花山文化进入“后申遗时代”,给处于花山文化圈的广西左江流域的文化旅游发展带来新的前景,也给该区域边境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带来新的历史性机遇。

2 花山文化与乡村振兴的成功经验与面临的挑战

2.1 成功的经验

2.1.1 文化自信夯实文明乡风基础。花山文化经过历代学者文人的考察、解读,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政府组织

的多学科融合考察研究,逐步把花山文化神秘的面纱揭示给世人,科学的考究使得历史上各种不确切的揣测与传闻得以更正,人们再也不会因为无知而对其敬而远之,甚至避之唯恐不及,特别是申遗前后的大量解读、宣传、教育,民众是接受了深刻的“文化普及”,应该说是经历了一场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蜕变,花山文化所蕴涵的思想与该区域的民族历史和现实生产生活相映照,使得广大群众更加坚定对花山文化的喜爱、保护和传承,使得维系稻作农业生产的文化传统再度升华为维系当今时代民族地区社会良好风尚的文化食粮与精神支柱,从而进一步夯实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文化根基。

2.1.2 文化传承意识促进产业发展和民族团结和谐。经过历次的考察解读,特别是申遗宣传、教育,花山文化不仅得以向“世外”广为传布,同时也如前文所述,再度唤起了该民族地区广大民众的文化觉醒。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的过程中,民众的传承、保护、传播的意识不断增强,在传承和弘扬该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上形成了一种新的生长点。如传统稻作农业应节气变化而带来的生产劳作及生活习惯的变化规律,在该区域民族中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文化,如壮族特有“三月三”、庆丰节、侬峒节等节庆文化,在今天仍在流传,唱山歌、独特的干栏建筑以及颇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婚丧习俗等,吸引众多“域外”民众的眼球,催生多样形态文化旅游产业,也在这一进程中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交往、互鉴,增进民族团结和谐,巩固边疆安宁。

2.1.3 稻作文明基因催醒生态宜居。作为丘陵稻作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的主体,广西左江流域世居壮民族世代传承着民族先祖骆越民族开创的“那”文化,源远流长的水田稻作农耕传统,不仅使该地区民族养成了一种“天人合一”的行为习惯,尤其是处于喀斯特地形地貌区域,水稻种植所需要的水源是万万不能破坏的,惯常于“住水头”的壮族,世代注重涵养水源,保护好森林植被,特别是对水源林的保护几乎成为一种信仰,这种行为历经千百年积淀进而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密码和基因,成为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的壮民族的一种特殊的行为自觉,这样的自觉在花山文化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进程中不断被激活,呈现出倍增效应,在政府倡导的文明乡村建设,整治左江流域河道、保护水源、防控花山受污染侵蚀等行动上,得到广大民众的大力支持和广泛参与,激发出强烈的生态保护意识,使得花山流域的生态环境治理取得显著成效。

2.2 面临的挑战 如前文所述,花山文化的成功申遗,无疑给当地的发展带来历史性的机遇,包括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环境的整治、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等都取得历史性突破和进步,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产生积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也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如可持续性问题,传统与现代相碰撞的问题,产业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国内外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文化变迁与传承的问题等,都是实现该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绕不开的课题,必须在持续推进乡村振兴中系统地加以解决。

3 “后申遗时代”的花山文化与乡村振兴的战略思考

3.1 彰显边疆文化、民族文化、红色文化特色,振兴西南边境民族地区特色文化产业 立足花山岩画分布区域的优势和特点,优化传统蔗糖产业结构,做强边境经济产业,振兴文化旅游产业,从根本上转变传统单一的经济结构。

3.1.1 优化传统蔗糖产业。广西左江流域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雨势同期,常年天气晴暖,日照时间长,适宜种植甘蔗,因而造就了崇左市“糖都”的地位,经过多年的良种培育和引进,实施大面积的连片区滴灌技术,循环经济系统的运营,低碳、绿色、环保的蔗糖产业在全区乃至全国都处在领先地位,保持着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近些年来,受各种叠加因素的影响,该区域传统的蔗糖产业也面临着一些难题和挑战,一是受国际国内市场变化的影响,蔗糖价格的波动较大,导致蔗农市场心理也受到较大打击和干扰,市场信心恢复期较长,甘蔗种植积极性的提振周期也较长,因而影响到甘蔗种植面积的稳定与扩大;二是产业链仍然拉得不够长,精深加工、附加值含量高的蔗糖类产品为数不多,直接影响到整体经济效益的提升;三是甘蔗种植基础的脆弱性依然成为困扰区域蔗糖产业的突出问题,喀斯特地形地貌形成的山多地少,土地相对贫瘠,比较肥沃的连片土地较少,加上水旱无常的气候影响,直接干扰着到甘蔗种植规模的扩大和产量的提高。要使这样的问题得以根本扭转,必须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给传统的蔗糖产业注入新活力、新动能,实现蔗糖产业的升级。首先要引进信息技术,运用大数据,发展电子商务等,及时反馈蔗糖产业的市场价格信息,畅通蔗糖产品的销路,确保蔗糖产业受到市场的冲击和干扰,免受价格波动的影响,稳定甘蔗种植。其次要拉长产业链,提升蔗糖产品品质,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品产业,同时引进高新技术,持续、深入地推进甘蔗生态产业发展,使循环经济进一步得到提升,持续保持绿色、环保、生态的蔗糖经济在全区乃至世界的领先地位。此外还要大力推行现代农业技术,推广机械化、自动化,加强对自然灾害的防控能力,实现旱涝保收,确保甘蔗种植的产量和品质。

3.1.2 做足“边”的大文章。花山岩画分布的广西左江流域位于祖国西南边陲,是中国通往东盟陆路通道上的重要地带,是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与越南北部接壤,山水相连,左江上游的支流来源于越南,如水口河发源于越南,从龙州县水口镇水口关流入我国境内,平而河也是发源于越南北部,经凭祥市流入国内,黑水河发源于靖西市,向南流入越南北部后折回流入国内,在大新县形成亚洲第一的德天跨国大瀑布,形成左江的另一条大支流。这样,平而河、水口河、黑水河三大支流与发源于十万大山流经宁明县的明江汇流后的左江水量大增,自古可通航。花山岩画上就绘有载满客人的大船图案,表明左江的河运早在历史上就有出现,只不过用岩画的形式替代文字的记载罢了^[10]。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时期,水运交通的发达带来了边关的繁华,特别是近代机械动力代替人力后,轮盘可由左江贯通邕江、郁江、西江而达东部的梧州、广州,因此旧时有“东有梧州,西有龙州”之说。通

过左江水运,可进出越南,故历史上的水路交通和边境贸易繁盛。新中国成立后,广西的第一条公路从龙州修到凭祥,把边境交通带入新的历史时期,后来铁路、高速公路相继开通,中国—东盟陆路通道日渐繁华,边境贸易也随之繁荣,友谊关成为名副其实的九大名关之一,于是以友谊关为龙头,凭祥的浦寨,宁明的爱店,龙州的水口、科甲、那花,大新的硕龙等地与越南的边境往来、口岸经济获得较快发展。近年来,该区域的工业园区经济发展速度及规模势头还不是很强劲,乡镇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规模经济发展缓慢,特色经济发展不明显,乡村振兴乏力,需要进一步找准发展方向和定位,把“边”的特色和优势真正充分发挥出来,转变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辐射整个区域,带动乡村振兴。

3.1.3 振兴文化旅游产业。以花山成功申遗为新的起点和新的历史契机,实现新时代左江流域的乡村振兴,应以花山文化传承、保护和开发为核心,将其他关联性的文化产业一齐纳入深度开发,形成文化旅游产业链,产生产业集聚效应,从而提高文化旅游产业的品质和效益,带动乡村振兴^[9]。

一是花山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开发。花山文化历史悠久,反映了从战国到东汉时期左江流域的西南骆越民族生产生活状况的生动图景,他们以祖先崇拜的原始宗教仪式祈求风调雨顺、子孙兴旺,号召人们团结奋起抵御外敌入侵和自然灾害,以示世代生息繁衍^[10]。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从生产生活实践中来又返回到生产生活实践中去,今天左江流域壮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也仍然保存着这些文化,比如花山拳,民间传承人至今已历经几十代人,还有花山舞蹈民间也仍然传承着,只不过在少数的师公和巫覡举行的仪式上流传,这样反映该区域民族民俗文化的传统就是一种特色民族传统文化,能够成为满足“域外人”对“异民族”或异域文化的“猎奇”眼光,成为文化旅游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当然,花山文化产业的开发,还是以浏览、考察花山岩画场景为主,但是只有在这样的民间传统文化中进一步地深入领会、了解和接纳,才能有深刻、系统、全面的体会,才有立体感,从而领略其全貌。

二是红色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开发。1930年2月1日,邓小平领导的龙州起义创建了中国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根据地,与右江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左江成为红色的热土,红色文化的传承、保护、开发,对乡村振兴不止于其带来的经济效益,更为重要的是其所带来的巨大精神财富。广义上的红色文化还包括近代著名的镇南关大捷、抗法战争的历史文物等,也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文化,如越南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胡志明的革命足迹。这些都成为红色文化产业,对左江流域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三是边关旅游文化的开发。包括边关历史文化、现代边关文化和边关自然风光等,理应成为该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力军、生力军,如友谊关既是历史文化名关,也是现代产业发展的重要门户,既是近代革命文化名关,也是改革开放时期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是中国通往东盟陆路通道的重要关口,发展好现代旅游产业、国际贸易,带动该区域经济发展,

振兴乡村经济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2 弘扬优秀的“那”文化传统,建设西南边境民族地区优美的生态环境 广西花山岩画主要集中在左江中上游地区,可以称之为“花山文化圈”,属于喀斯特地形地貌,山多地少,受季风气候影响,水旱无常,生态环境脆弱,必须在传承“那”文化传统,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基础上,持续推进清洁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壮美广西”建设,才能实现名副其实的乡村振兴。

3.2.1 传承优秀的“那”文化传统,树牢生态发展理念。花山岩画反映了战国到东汉时期“花山文化圈”处于原始落后的“大石铲”时代^[10],这时期石器还不是很精致,属于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的转换期,生产力极其低下,但是“大石铲”工具的使用却是南方稻作农业的标志,稻作农耕属于精耕细作型,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稻作文化,在壮族地区叫“那”文化,壮语管“那”叫水田。“那”文化在生产生活上都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生产上水土保持是水稻种植的基础和先决条件,如上文所述,“花山文化圈”生态环境本就脆弱,土地贫瘠,水稻种植所需要的基本水土资源匮乏,只有在山间小块坝田水土保持良好的情况下才有水稻种植和收获的可能,因而,保护山林、涵养水源、保障水稻种植的水源是壮族人民千百年来劳作所获得的经验,同时,注重储蓄水源、节约灌溉用水、兴修水利也成为一种行为习惯,世代累积下来便成为一种传统劳作文化。

“那”文化在壮族生活领域上主要体现在传统的干栏式家居建筑、稻作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和节庆文化上,这些文化也都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比如,传统的干栏式家居建筑也叫“勾栏”建筑,是古老的壮族先民为躲避南方瘴疠暑热之气和虫蛇猛兽的侵扰,从有巢氏“构木为巢”得到启发而建造的一种家居建筑,房屋结构分为上中下3层,中层住人,下蓄猪牛,上层晾晒粮食,就地取材而建,土木结构,卯榫工艺巧夺天工,四梁八柱稳重大方,注重房前屋后的绿化,青砖红瓦掩映在苍松翠竹间,或古朴或简约,背靠青山,面向河流而建,小桥流水,恬静和美,这样的生产生活理念是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理念的重要体现,将之传承好对于美丽乡村的建设大有裨益。

3.2.2 持续推进蔗糖产业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蔗糖产业作为“花山文化圈”的支柱产业,发展迅猛,在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稻作农业发展的模式,但是传统的“那”文化生态理念并没有受到冲击。比如在保护土地和水源,实行节约用水上的理念和行为仍然保持水稻种植的优良传统,保护好水源林,实行滴灌技术等,仍然是群众普遍遵守和执行的自觉,同时,加大高科技的引进和利用,走循环经济发展之路。一方面,走“蔗—菇—牛—沼气”或者“蔗—菇—牛—渔”模式,可持续推广,鼓励蔗农积极参加土地“小块并大块”,发展规模经济,加入合作社,实现现代农业的经营、管理,从甘蔗的种植、护理到蔗糖加工实现一体化生产,使一根甘蔗全身是宝的价值得以完全实现,将甘蔗根茎榨糖,蔗梢、蔗叶作为牛饲料或者蘑菇种植的原料加以充分利用,牛或菇的末端排放

也可以用来养鱼,实现循环利用,不造成浪费或污染。另一方面,在蔗糖加工上拉长产业链条,同样也可以实现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保持生态平衡,比如管好“三废”循环利用,减少碳排放,甘蔗加工生产蔗糖之外,将蔗渣转变为造纸原料进行造纸,或燃烧发电,实现蔗渣的循环利用,变废为宝。甘蔗加工所产生的废料加工成肥料,生产出复合肥,一部分直接加工成液体肥料通过管道进行蔗田回灌,既减省成本,也降低污染发生率;一部分肥料对外出售,实现部分经济效益;一部分废液加工成酒精、酵母等,也可以实现循环利用,减少环境污染;通过产业链的拉长,进行蔗糖产品的精深加工,也是实现低耗能、高效益的目标,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增强动能,为乡村振兴提供物质保障。

3.2.3 持续推进清洁乡村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传统“那”文化不仅体现在生产生活上,还体现在村容村貌的整洁上。近些年广西实施清洁乡村工程,城乡全面开展清洁卫生大扫除,城镇建设垃圾回收处理厂,农村建设垃圾焚烧炉,整治市容市貌、村容村貌;严格执行河长制,进行污水整治处理;稳步推进厕所革命,倡导健康生活,保持良好卫生习惯,为生态宜居的乡村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生态条件。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出现空心化,留守老人、小孩、妇女问题,使得乡村清洁卫生的可持续性进展受到影响;城乡虽然有了垃圾处理的设施设备,但是垃圾没有得到很好的分类,焚烧处理也会带来新的污染;由于成本、技术、劳力等因素的欠缺,也直接导致生活污水的处理和排放未得到有效管控。这些问题需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资金、技术、人才和劳力的投入,进一步强化执行力,建立长效机制,持续推进城乡清洁卫生工作,确保取得实效。

3.3 传承花山文化精华,构筑西南边境民族地区和谐和美文以花山申遗成功为历史契机,保护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以壮族山歌、传统节庆活动为载体,大力传承、弘扬花山文化精华,构建“后申遗时代”“花山文化圈”的文明新风尚,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和文化保障。

3.3.1 传承花山文化思想精华,增强文化自信增进民族团结和谐。花山申遗成功极大地增强了“花山文化圈”的世居壮族人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由于历史上对花山文化的不科学解读,造成民间敬而远之的心理,如宋代李石在《续博物志》卷八中说:“二广深谿石壁上有鬼影,如澹墨画。船人行,以为其祖考,祭之不敢慢。”明代张穆的《异闻录》则有更神秘的记录:“广西太平府有高崖数里,现兵马持刀杖,或有无首者。舟人戒无指,有言之者,则患病”。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级政府多次组织专家学者开展科学考察,“千古之谜”的花山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权威分析、判断以及科学结论,使人们渐渐信服,不再表现出迷信、隐讳的心态,而是正确的认识、认可和接纳,并引以为荣耀,普遍地将之视为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精华而自觉地参与守护、传扬、传承的活动中来。花山文化自然而然地成为该地域民族人们增进民族团结和谐的心理基础和共同的精

神支撑,成为名副其实的“民族魂”,作为内生动能的外化,民众自觉参与支持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维护本区域生态文明,共同致力于文明乡风的建设和维持,形成良好的社会文明风尚,巩固文明和谐的良好社会局面。

3.3.2 弘扬山歌文化,促进文明乡风建设。孔子有言:诗可以兴、观、群、怨,这样的判断同样可以适用于对当代各民族民间山歌文化的评判。壮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花山文化圈”的世居壮族人民在几千年“那”文化生产生活模式的传承中,也世代延续着流传千百年的歌舞文化,花山岩画的主题是古壮先民骆越人举行盛大的祖先祭拜,祈求风调雨顺,呼号人们起来抵御外族入侵、与大自然进行抗争,祈愿子孙世代兴旺、族人永世发达。举行这样盛大的具有浓郁原始宗教色彩的祭奠仪式,自然少不了以隆重的歌舞形式来表达,于是铜鼓播起来,蛙舞跳起来,刀剑舞起来,骆越拳术打出来,狂热山歌吼起来,响彻云霄,环绕山谷。后来,在稻作农业生产生活的漫漫历史中,壮族世代传承着这样的仪式,有集中的群体活动,也有分散进行的,样式灵活,田间地头,泉边林下,江边河坝,坡头草地,赶墟归来,无地不歌;节日喜庆,朋友欢聚,庆典活动,男女恋爱,春播秋收,无时不歌。广西素有歌海之称,左江“花山文化圈”亦是歌的海洋、舞的世界。山歌的主题也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而变化,内容丰富多彩,传统上包括四季歌、恋爱歌、婚庆歌、节庆歌、赶墟歌、农事歌、祝酒歌、颂扬歌、劳作歌、劝诫歌、时事歌等。新中国成立后,有歌唱新生活的,有歌颂祖国伟大成就,赞颂新时代,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的。在壮族人看来,凡事皆可入其歌,以歌言其事,这样的山歌可以育万民,淳风俗,山歌对文明乡风的养成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3.3.3 繁荣发展民族传统节庆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风尚。受传统“那”文化的影响,“花山文化圈”的世居壮族人民的传统节庆文化也是浓郁而热烈的,节日活动丰富多彩,体现着稻作农耕悠闲与忙碌有序交替的节律,水稻种植在壮族传统生产劳作中是毕恭毕敬的事情,从春暖开播的仪式开始,

中间要经过育秧节、牛魂节、田魂节、丰收节或依垌节,才算是完成一个稻作周期,牛魂节、田魂节很有仪式感,也是表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面,意思是在大农忙时节,耕田耙田累坏了水牛,要在水稻种植完成后的某一个特定时间好好侍候牛,给牛在家休整一天,把上好饲料给牛喂好;田魂节也是一样,稻子灌穗拔节时候,举行仪式,祈愿稻穗饱满无灾,保证得到好收成。传统的丰收节或依垌节是最隆重的,时间也是最长,一般三天左右,家家户户打糍粑,整好几桌饭菜,盛情款待远亲近朋,吃饱喝足后尽情玩乐,有唱山歌的,有表演民间文艺的,有进行传统民间体育活动的,十里八乡的男女老少一齐聚会。这样的节日是自发轮流举办,约定俗成的错开时间来举行,旧时以“垌”为单位,“垌”是山间平原的一个大范围片区,大致比现行乡镇建制范围要大一些,包括几十个村屯,一般生活习俗相近,社会心理意识、生产生活方式相差不是很大的人们才能凑到一起来,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心理和情趣,这样的活动可以扩大交往,有利于增进他们的感情,巩固团结和谐的社会局面,维持良好的社会文明风尚。

参考文献

- [1] 冯俊锋. 乡村振兴与中国乡村治理[M].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
- [2] 郭俊华, 卢京宇. 乡村振兴:一个文献述评[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50(2): 130-138.
- [3] 刘有祥.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贵州实践[J]. 贵州民族研究, 2020, 41(3): 106-112.
- [4] 李军, 甯锐, 向轼. 乡村振兴视域下西南民族村寨多元协同反贫困治理机制研究:基于第一书记驻村村的分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20, 41(1): 194-202.
- [5] 孙景淼. 乡村振兴战略[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
- [6] 王文龙.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应厘清五大问题[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2): 82-90.
- [7] 唐华. 花山文化研究[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6: 24-26.
- [8] 蒋肖斌. 中国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成功申遗[N/OL]. 中国青年报, 2016-07-15 [2021-09-27].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715/e1002-28558561.html>.
- [9] 蒋丽霞. “非遗+”文化融合促进农村“物质和精神共富”的实现路径研究[J]. 安徽农业科学, 2022, 50(20): 254-257.
- [10] 覃圣敏, 覃彩鑫, 卢敏飞, 等. 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M].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7.
- [11] 王金友. 扬州市浦头镇乡村人才振兴实施中的问题和对策研究[D]. 扬州:扬州大学, 2021.
- [12] 陈冀鲁. 河北省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研究[D]. 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 2022.
- [13] 涂孟梅.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研究:以四川省A县为例[D]. 南充:西华师范大学, 2020.
- [14] 刘嫦娥, 谢玮. 乡村振兴战略下人才“回流”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 19(5): 73-76.
- [15] 邵亮亮, 杜志雄. 中国农业农村人才:概念界定、政策变迁和实践探索[J].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2017, 10(1): 115-125.
- [16] 朱永甜, 余劲.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收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陕南三市1680份农户数据[J]. 资源科学, 2021, 43(10): 2013-2025.
- [17] 刘新智, 周韩梅, 王小华. 农地流转缩小农户收入差距了吗?——基于CFPS的微观证据[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1, 20(4): 501-510.
- [18] 单德朋, 张永奇. 创业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及机制研究[J]. 华东经济管理, 2021, 35(3): 93-101.
- [19] 金晓彤, 路越. 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居民增收[J]. 当代经济管理, 2022, 44(1): 44-52.
- [20] 秦芳, 王剑程, 胥芹. 数字经济如何促进农户增收?——来自农村电商发展的证据[J]. 经济学, 2022, 22(2): 591-612.

(上接第 246 页)

- [12] 陈冀鲁. 河北省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研究[D]. 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 2022.
- [13] 涂孟梅.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研究:以四川省A县为例[D]. 南充:西华师范大学, 2020.

(上接第 250 页)

- [3] 陈如静, 郑少锋. 资本禀赋、专业化生产程度与农户收入:基于山东省寿光市的调研数据[J]. 世界农业, 2022(4): 109-119.
- [4] 谭燕芝, 姚海琼.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农户增收效应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 2021, 33(9): 91-102.
- [5] 赵斌杰, 李春园. 乡村振兴战略下内蒙古农村产业融合对农牧民增收的影响机理研究[J]. 安徽农业科学, 2019, 47(22): 235-237, 279.
- [6] 高强, 曹翔. 农业补贴、资源禀赋与农户收入差距[J]. 财政科学, 2021(12): 66-80.